湖南耒阳蔡侯祠蔡伦造纸图。 刘德华 绘

湖湘名人蔡伦始

——纪念纸圣蔡伦逝世1900年

甘建华

公元121年3月28日，出生于湖南耒阳，发明了造纸术的蔡伦去世。1900年过去，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仍值得被铭记。

——题记

一

“如果没有蔡伦，就没有纸，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状况。”

1978年，美国人迈克尔·哈特出版《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蔡伦排第六；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公布有史以来的最佳发明家，蔡伦排名第四。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评论说：“中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传到欧洲，令人震动，可以和现在把人送上月球的探索相提并论。”

法国安贝尔市蔡伦馆展出文字说：“蔡伦的杰出贡献和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文明揭开了新的篇章。”前苏联学者苏赫曼在《造纸学》一书中说：“中国蔡伦在1800多年前发明了纸，其他任何发明，对文化发展的促进，都不能和纸相提并论。”英国威尔斯博士说：“造纸一事，尤为重要，即谓欧洲文艺复兴之得力于此，亦不为过也。”

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说：“土生土长的湖南人而彪炳史册的，蔡伦应是第一人。常有人说湖南出政治家和军事家，而少有发明家和科学家，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蔡伦是湘人的缘故。”

1962年12月1日，邮电部发行一套纪92《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二组）纪念邮票，全套共8枚，其中一位就是蔡伦，蔡伦遂成为国家名片。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一卷古代形制的画轴贯穿始终，而在大屏幕中用影像表现的蔡伦造纸术，飘逸洒脱，令人叹为观止。

耒阳本土也在不遗余力地推介先贤蔡伦，“崇尚科学，传承文明”。2001年，在原蔡侯祠基础上扩建的蔡伦纪念园，面积达9万多平方米，现在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达30余万人次。在城区西湖路狮子岭下，修建占地340亩的科技发明家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14.7米高的蔡伦铜像。2001年9月8日举行了首届中国耒阳蔡伦科技发明节开幕式。

2009年初，蔡伦古法造纸技艺入选湖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11月11日，国务院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耒阳“蔡伦古法造纸技艺”入列。2009年末，耒阳黄市镇拥有16万亩连片竹林的蔡伦竹海风景区，第一次向世人发出“亚洲最大竹海寻胜探幽之旅”的盛情邀请。翌年11月4日，以“蔡伦故里，竹海家园”为主题的中国（耒阳）蔡伦造纸文化旅游节，隆重举行了蔡伦发明造纸术1905年纪念大典暨蔡伦塑像揭幕仪式、“蔡伦故里”省级风景名胜区授牌仪式、“蔡伦竹海”省级水利风景区授牌仪式、“蔡伦竹海游”启动仪式、纸博物馆开馆大典等。

二

蔡伦，字敬仲，东汉桂阳郡耒阳（今湖南耒阳市）人，约永平六年（公元63年）生于南平亭一个普通农家，永平末年（公元75年）被选入洛阳宫内做太监。他在家乡曾经读过私塾，据说学业优异，因此很快就在太监群中鹤立鸡群，引起了章帝刘炟正宫窦皇后的注意。

此后，蔡伦一生在内廷为官，先后侍奉过四个幼帝，投靠两个皇后，节节攀升，功居列侯，位尊九卿。但在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三月二十八日，“帝敕使自至廷尉，伦饮药死”，服毒自尽，死后葬在封地。在《后汉书》中，蔡伦被载入《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蔡伦兼任尚方令，主管宫内御用器物和宫廷御用手工作坊。由他设计、监制的宝剑和宫中器物，“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这期间，他造出了植物纤维纸。

蔡伦发明造纸术，《后汉书》有着明确的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博物志》载：“蔡伦煮树皮以造纸”，“蔡伦始捣旧鱼网造纸”。《后汉书集解》称：“蔡伦挫捣故布网抄作纸。”《东汉观记校注》载：“伦典尚方，作纸，用故麻造者谓之麻纸，用木皮名谷纸，用故鱼网名网纸。”

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蔡伦还受命主持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的编纂工作。

人类自有文字产生以来，就一直在寻找轻便易得、能大量生产的廉价书写材料，曾使用过泥板、石板书写，也曾用羊皮、丝绸书写记事，还有在木板上涂蜡，然后用针刻蜡记事。埃及人用莎草纸，印度人用贝多罗树叶写字。只有蔡伦发明的纸，克服了所有书写材料的弱点，是最轻便、廉价易得、能大量生产的文明载体。

蔡伦造纸术发明后，西晋文学家傅咸（239—294）写下了第一篇咏纸的文章《纸赋》，文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从文中可看出，蔡侯纸问世后的最早用途之一就是书信。取代驿马运载笨重的简策，不必用昂贵的缣帛作为一次性投递的书信，成为汉晋中原大批士卒从军戍边之急需，从此，“天下莫不从用”的“蔡侯纸”，随着书信频繁流动而使造纸术迅速传播各地。

蔡伦造纸术的发明，使中国古代的文明与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世界一千余年，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思想交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至今也不可缺少的信息存贮和传递手段。例如，中世纪欧洲印刷一部《圣经》，至少需要300多张羊皮。而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因此，美国学者德克·卜德说：“世界受蔡侯的恩惠，要比受许多更知名的人的恩惠更大。”

唐代诗人李峤在《蔡侯纸》一诗中赞叹道：“妙迹蔡侯施，芳名左伯驰。云飞锦绮落，花发缥红披。舒卷随幽显，廉方合轨仪。莫惊反掌字，当取葛洪规。”而“一时制作崇轻省，万古文章藉卷舒”，则是明代耒阳籍进士胡文璧《蔡池夜月》一诗对蔡伦造纸的咏叹。

中国书法史永远不能缺少蔡伦的名字。“有了纸，中国书法的章法开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中国书法的墨韵进入了五色交辉的时代，中国书法的神态增添了顾盼生情的风致”。

三

蔡伦是中国的造纸祖师，差不多所有产纸的地区都为他塑像造庙，奉祀为神。

元代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九月，耒阳知州陈宗义重修蔡侯庙。“度其故地，为祠一所，仍设侯像于中。祠旁置屋，募民居之，以奉祀事。又于骜山乡北冲口，置田一十亩，并广济仓后。”陈宗义还“亲置桑一百四十株，俱付其祠，以充给赡”。

到了清代，官府在旧址兴建蔡侯祠，祠后为蔡伦衣冠冢。今墓前碑坟额题“蔡伦之墓”四字，为郭沫若1959年手书。2001年9月，耒阳市举办蔡伦科技发明节，举行公祭蔡伦大典，新建发明家广场，扩建蔡伦纪念园，园内增设蔡伦造纸作坊，周谷城题写“蔡伦纪念馆”匾额，门联依旧：“芳池月映；故宅风存。”

200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征程，中国纸业迎来了发展巅峰。是年9月22日，由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主办的首届中国纸业发展大会，评选出“影响中国纸业30年——首届中华蔡伦奖”，那些影响中国纸业发展进程的风云人物，获得了应得的荣誉。

在世界范围内还鲜有以中国人姓名命名的国际性奖项。2010年10月19日，在上海世博会DEVNET馆（国际信息发展网馆）举办的国际制造创新节上，设立了以蔡伦名字命名的“蔡伦奖”，旨在鼓励发明创造，激励技术创新。

也许有人认为，发明都是其时代的产物，蔡伦没有发明纸，还有另外的人会发明。但美国人迈克尔·哈特说得好：“造纸术的发明远比世人想象的更为艰难。它需要一个发达的国家做背景，并且还需要杰出的个人天赋。”

蔡伦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走了1900年，作为湖南第一个文化名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化名人，我们纪念他。

湖南耒阳蔡伦纪念园。 甘建华 摄

父辈的旗帜

——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我家那颗最亮的星

刘艳

1949年8月，安化县丰乐乡（今涟源市桥头河镇）。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五团的新兵入伍现场。一个清秀的后生背着行囊，双眼微红，挥手和送他的爹娘弟妹道别。

这名18岁的新兵，名叫李耀中。这个名字，是他报名参军时自己改的，寓意为“光耀中华”。入伍后，他被分配至五团机炮队一分队机二班，不久任副班长，后来又任连部文书。部队改编后，他担任了中南军区48军143师428团二营文书。

1951年年底，涟源县桥头河公社清塘大队排头屋。一位妇人站在自家门口，远远望着一位穿土黄色军装的军人越走越近。她心头一喜：“莫不是大崽回来了？”

“黄军装”果真走到了她家的檐廊下。但他不是大崽。她再也见不到那个会帮她纳鞋底、纺棉花的大崽了。1951年8月，她的大崽在海南剿匪中负伤，9月，在部队赴朝鲜作战途中牺牲。“黄军装”送来的，是大崽的遗物和一张革命烈士的证明书……

悲痛的娘，在床上躺了七天。她的二崽，领着弟妹在床前跪成一排：“娘，大哥走了，还有我们呀！你不起来，我们就不起来……”

伤心的爹，夜深人静时一个人在煤油灯下细细翻阅大崽留下的两个笔记本，越看心越痛。封面上用蓝色钢笔写着“为人民服务”、“努力学习”，手绘着五颗五角星还有党徽。“李耀中”三个字，格外端正。一个本子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另一个本子贴着大崽在部队珍藏的照片，留下了很多空白页……

许多年后，从悲痛中走出来的爹娘，请人对着大崽的照片画了一张大画像，将其与“烈属荣府”的牌匾和“革命烈士证明书”挂在堂屋正中。从此，大崽与荣光抬眼可见。

又过了许多年，伤心的爹娘已逝去，他们的孩子，也都已是儿孙绕膝的老人了。

每到中秋或春节亲人们相聚时，关于“大哥”的点滴回忆总是勾起无限的怀念。

——爹在堂屋里办了私塾，有次发现大哥没有带书本，问他，他讲书都背得了。爹当场考他，从头背到尾一字不差；

——大哥去海南剿匪前回过一趟家。我娘坐在饭桌旁跟大哥讲，娶个媳妇再去海南。大哥没答应，讲剿匪回来再结婚；

——大哥细时候练过武，水性又好，在洞庭湖剿匪时还抓了一个匪头，部队奖了他勋章、钢笔还有手表。我还记得他那张胸前挂着勋章的照片，真是威武得很……

大伯，也是我们家一代又一代人的红色榜样。

1956年5月，二伯在大伯留下的笔记本上写道：“哥哥，安息吧！弟弟会踏着你的血路，去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他在求学路上克服种种艰难，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一辈子教书育人。两位姑妈也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一辈子，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等不少荣誉称号。

我的公公，当年坐在大伯肩头被他宠着的幼弟，现在也到了古稀之年。2017年，在涟源市洪水岭举行的“清明祭英烈”活动中，公公作为烈士家属发言：“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遗志，教育好下一代来报效祖国。”

公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生产队长、村干部、镇干部的岗位上，他扎根基层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他的“初心”，向他大哥看齐。有人来送礼，他不收，甚至会“不近人情”地扔到屋外。退休后，他还是忙得脚不沾地。哪家有红白喜事都爱请他来主持；村干部常来串门，听听他的意见；邻里有了矛盾也请他去调解。村里人信服他，因为他做事严谨，公允。

公公1986年入的党；哥哥1996年在部队入了党；我家先生，2008年也入了党。家中客厅里挂着“共产党员之家”的小牌。记得儿子“咿呀”学语时，公公就经常抱着他一遍遍教着：“党，共产党的党……”

2019年，先生单位参加“红色故事”宣讲活动，他写好了革命烈士卢天放的故事剧本，却找不到人来演。只好自己上场，结果竟拿了个奖回来。原来，大伯是他从小到大的偶像，他将卢天放当成大伯来扮演，把自己对大伯最真实的情感融入了角色。

这些年，我们家族聚会时常讨论的一件事，就是想找到大伯牺牲后具体的安葬地，但一直没有结果。烈士证书上只写了广东曲江。2018年，我们在老家为大伯立了一块朴素的纪念石碑，两旁植了八株柏树。第二年清明节，亲人们肃立碑前，鞠躬默哀。我们对大伯的怀念敬仰之情，终于有了安放之处。

前几天，先生拿出大伯发黄的笔记本拍照保存。当年的照片不复存在，但封面上“为人民服务”的笔迹却依然挺拔。

从1949年8月入伍到1951年9月牺牲，大伯经历了怎样的青春磨砺？海南剿匪中他为什么受了伤？他带伤赴朝，一路上他又经历了怎样的病痛折磨？我们还能找到大伯的安葬地，前去为他上一炷香，祭一杯酒吗？

我们还没有答案。大伯最美的青春年华，也是他最后的生命时光，已无言地沉落在历史的深处。

又是一年清明时，窗外细雨纷飞。我想，在无数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星辰中，大伯不是最耀眼的那颗，但他却是我们家最亮的那颗星。“烈属荣府”的红色牌匾，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大荣耀。

归来依旧是少年

——世纪诗人朱健与《白色花》

如筝

98岁高龄的朱健先生告别了尘世，他被有的学者称为“最后的七月诗人”，因为他的一首长诗《骆驼和星》，1945年1月发表在胡风先生编辑的《希望》杂志第1集第1期上。胡风先生正是七月诗人的核心。

长诗《骆驼和星》是这样开头的：

昨夜，在干涸了的河底聚会
一位诗人说了一个沙漠的童话
十万年前
沙漠是一片跳跃着波浪的大海
像一座绿色的洞穴
那里住着无数绿色肌肤的美男子
在多星的夜里
他们自海底跃出
赤裸了全身，披散着头发
唱着歌
互相抛掷着浪花
宏亮的合唱
摇动了天空
星星们思凡了
一个一个摇摇欲坠
他们都是被星的眼睛诱惑而歌唱啊
于是，星星被禁止在夜间发光
必须蒙着头睡眠
长诗又是这样结尾的：
在我同你们见面的日子
地上，天空和海洋
一样明亮
人民
因日夜的光明而得福……

胡风先生当时称赞这首诗是“从一个深沉的胸怀里成长出来的故事”。

朱健先生在晚年认为，《骆驼和星》是自己诗歌创作中不可重现的“生命的自然的流动”。他说，《骆驼和星》“就像一棵笋一样，突然拱出来，…… 当时我不到20岁，没读过什么书，没多少经历，也没有构思，有如神助，突然就开始写起来了。我记得写完这首诗大概用了两个晚上，点着蜡烛写，写得痛哭流涕，写完之后，正好太阳出来了，如释重负。”应是缪斯唤醒了诗人那颗潜藏的诗心。

所谓“七月诗派”是指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这段岁月中，环绕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两个美学立场坚定、创作性格鲜明的大型刊物而形成的一个诗人群体。朱健先生是《希望》的作者，被人们称作“七月诗人”应该不算错。

仔细端详，朱健先生的照片上隐约还散发出一层柔和的光影——是那种圣洁的白光。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20人的诗歌合集，名曰《白色花》。这20位作者是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朱健先生正是这20名作者之一。在一段时期，人们把《白色花》当作“七月诗派”的代表作。该诗合集系人民文学出版社诗歌组主动约编的。

20名作者大多生于1920年代，20岁上下开始写作，他们是同抗战文艺一同成长的，多是《七月》《希望》的后期作者。从艺术倾向上说，《白色花》不能完全代表七月诗派，但绝对可以视为该流派的局部投影。诗合集忠实记录了作者们当年所走过的一段道路，在抗日战争和寻求民主自由的洪流中，他们为自由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作者们所经历的那个历史时期，民族危机笼罩，政治形势严酷。在中国苦难的土地上和人民炽烈的斗争中，诗人们依靠着相同的政治信仰，坚信人民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将现实生活视为他们创作的主要源泉，对他们而言，诗就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就是捧向人民的鲜花。

《白色花》的及时出版，客观上促成了“七月诗派”在历史中的重生与正名。浮沉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四十年代的新诗绝非空白，而且有过一批有血有肉以诗歌为生命的真诗人，他们那些撼动人心的诗句将会长留人间。

望着朱健先生的照片，思绪又飘回来：对于朱健先生，是称他“最后的七月诗人”好呢，还是称他为“最后一支白色花”合适呢？我觉得，虽然都可以，却都不精准。因为“七月诗人”属于历史性的称呼，七月派存在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十年代之后已经没有流派活动了。在《白色花》的作者中，虽然朱健先生谢世最晚，我却不想称他为“最后一支白色花”。因为《白色花》的出版，同样也是一个历史阶段，从出版之日到今天，又过去了40年。

98岁高龄的朱健先生，寿近一个世纪，我倒更愿意称他为“世纪老人”。他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参加过争取民主自由的奋斗，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他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却遭遇了政治错案的磨难。后又长时间地置身于“劳动改造”中。当社会回归正常时，他没有去“当官”，而是回归了文化。他参加了《辞源》的修订，笔耕不辍地写着电影剧本、写着诗、写着散文和随笔。所以学者点赞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读书界视域中，不仅是“别具慧眼的‘红迷’”，“更是文采风流潇洒的美文家”。朱健先生最终“在文化的领域与天地里，找到了自我”。

于是我心豁然：这位高龄诗人云游世纪归来，满面沧桑，内心却仍是那名潇洒少年。